

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的历史与现状

赵 娜 朱传忠*

伊斯兰势力在 2011 年的中东变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突尼斯到埃及,从利比亚到叙利亚,无不显现着伊斯兰势力的影响。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在大选中获胜,埃及以穆斯林兄弟会为班底组成的自由与正义党在第一轮投票中遥遥领先,摩洛哥国内的伊斯兰势力也效仿土耳其成立了正义与发展党。然而,作为政治反对派力量的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下文中简称叙兄弟会)并未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拟结合叙利亚委任统治时期、议会共和制时期和复兴党执政时期新旧秩序剧烈变动的时代背景,梳理叙兄弟会的发展演变,把该组织的发展演变史分为酝酿和成立时期(1920—1946 年)、合法参政时期(1946—1963 年)、转向激进时期(1963—1982 年)、海外流亡时期(1982 年—至今)四个阶段,探讨叙利亚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变动的历史轨迹,进而对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个案进行评价。

酝酿和成立时期(1920—1946 年)

叙兄弟会的出现原因和具体成立于何时是一个困扰国内外学术界多年的问题。^①一般认为,叙兄弟会的出现并没有一个确切时间,该组织经历了 20 世纪 30 年代的酝酿阶段后,于 1945—1946 年统一成为穆斯林兄弟会。而且,叙兄弟会的兴起同当时叙利亚国内环境密切相关。文化传统、经济结构、地域环境是考察叙利亚国内伊斯兰组织产生与发展的三大主要因素。

委任统治时期叙利亚境内伊斯兰组织的出现及其活动为兄弟会的产生奠定了组织基础。诚如学者所言,兄弟会的根本使命是结束法国殖民统治,使叙利亚获得独立,并在伊斯兰教教义指导下进行社会改革。^②事实也证明,兄弟会与多个协会(哲马提,

Jma 'iyyat) 渊源深厚。1924 年,贵族协会(Jam 'iyyat al - Gharra') 成立,标志着叙利亚历史上第一个群众性伊斯兰组织的诞生。1925 年反对法国委任统治的大起义失败后,又出现了多个宗教组织。这些组织主要有伊斯兰指导协会(al - Hidayat al - Islamiyya, the Islamic Guidance)、伊斯兰文明协会(al - Tamaddun al - Islamad, Islamic Civilization)、公正与道德协会(Jam 'iyat al - Birrwa' l - Akhlaq, the Righteousness and Mores Association) 等。这些组织均反对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实行的世俗主义教育政策。

从地域分布来看,大马士革、阿勒颇、哈马等地是伊斯兰组织和协会活动最为活跃的城市。例如,大马士革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卡迪尔·穆巴拉克在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建立了协会。这个组织始于叙利亚大学的一个学习小组,目标是倡导精神改革,净化穆斯林的灵魂,引导他们向主,传播伊斯兰教教义和圣训。随着该组织的成长,其领导人决定扩大活动和规模。1935 年,他们在阿勒颇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1937 年 4 月,这个学习小组获得政府批准。埃及兄弟会认为这是该组织在叙利亚的第一个分支(markaz)。阿勒颇小组把其集会场所称为“达拉—阿拉卡姆”(Dar al - Arqam)。^③据信,“达拉—阿拉卡

* 作者单位: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① 国外学者的论著和文章中,出现了多个兄弟会建立的时间,有 1944 年说、1945 年说、1946 年说、1945 冬至 1946 年春夏之间说。国内学者认为,1935 年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在阿勒颇建立。参见金宜久、吴云贵著:《伊斯兰与国际热点》,东方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25 页。

② 吴云贵、周燮藩著:《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版,第 360 页。

③ 阿拉卡姆·伊本·阿卜杜·麦纳·伊本·阿萨德是伊斯兰教的最早皈依者,他把自己的家提供给先知穆罕默德作为布道场所。

姆”还举办阿勒颇穆斯林青年协会的活动。^① 1937年,学习小组宣布在大马士革建立“穆斯林青年协会”(Jam 'iyyat al - Shubban al - Mulismin),该组织与霍姆斯的宗教联盟(Rabita al - Diniyya)保持联系;学习小组还在拉塔基亚建立了一个协会,并与伊斯兰高贵行为和道德协会(Jam 'iyyat al - Makatim wal - Akhlaq al - Islamiyya)建立了联系。同时,这一时期从埃及学成归来的宗教人士也加入了成立协会的活动。1941年,穆斯塔法·西巴仪从埃及返回霍姆斯,成立了名为穆罕默德青年(Shabah Muhammad)的组织,法国委任统治当局以从事反政府活动的罪名将他逮捕。^②

然而,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这些协会之间的联系一直是松散的,但是这种松散联系能够确保叙利亚的伊斯兰组织召开全国性会议。1937年,叙利亚的伊斯兰组织曾在霍姆斯召开过两次会议;次年在大马士革召开的第三次会议上,阿勒颇的“达拉—阿拉卡姆”被定为这一松散联盟的办公中心。1943年第四次大会在霍姆斯举行,成立了两个准军事组织——萨拉亚(saraya)和青年人(futuwwa)。在1944年第五次大会上,领导层决定将总部从阿勒颇转移到大马士革,并成立了最高中央委员会。值得一提的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1945年冬到1946年春夏之间,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正式成立,西巴仪被选为总训导师。

此外,在叙兄弟会早期发展史中,埃及兄弟会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叙利亚曾是埃及兄弟会扩大势力的首选目标。埃及兄弟会的一个代表团曾经访问过叙利亚首都,其撰写的报告称那时在叙利亚已经存在着兄弟会组织的活动。^③ 叙兄弟会的第一代领导人如穆斯塔法·西巴仪、穆罕默德·哈米德都曾在埃及艾资哈尔大学学习,他们在那里与埃及兄弟会创始人哈桑·班纳成为密友。^④ 生于1915年的西巴仪,于1933年赴艾资哈尔大学学习,很快与班纳相熟。西巴仪在兄弟会中非常活跃,1934年因参加埃及的反英活动被捕。1940年,西巴仪又因支持伊拉克拉希德·阿里的反英起义,再次被捕。穆罕默德·哈米德甚至还曾任班纳的顾问。然而,叙兄弟会领导人并不承认与埃及兄弟会的关系。1955

年2月27日,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西巴仪指出,叙兄弟会与埃及兄弟会并没有组织和行政管理上的联系。^⑤ 而且,没有证据表明,两国兄弟会有财政上的联系。的确,叙兄弟会基本上是一个小范围的精英主义集团,从未达到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民众支持程度。而且自成立后,叙兄弟会与埃及兄弟会就有着很多不同的地方。这主要表现在领导人的社会构成、民众的支持程度、具体目标、行动模式和民主经验等方面。

首先,在领导人层面,与埃及兄弟会不同,叙兄弟会的创始人多是乌勒玛或来自于乌勒玛家族。如穆斯塔法·西巴仪出生于霍姆斯的一个乌勒玛世家,毕业于埃及艾资哈尔大学,并获得了伊斯兰法学博士学位。而且,许多领导人都主张尊重苏非主义,而不是对它进行批判,承认苏非主义在伊斯兰复兴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叙利亚兄弟会与教职人员合作,经常咨询他们的意见,而不是挑战他们。

其次,叙利亚兄弟会未能像埃及兄弟会那样吸引广大民众的参与。其成员和支持者基本上局限于传统逊尼派城市中下层:宗教人士、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这与叙利亚国内多教派、多族群的现实是密切相关的。

第三,在意识形态方面,叙利亚兄弟会未能形成一种全面的、系统的、明确的意识形态。在西巴仪时期,主要指导思想是伊斯兰社会主义,主张伊斯兰是包容一切的意识形态。西巴仪是伊斯兰社会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其著作就以《伊斯兰社会主义》(Ishtirakiyyat al - Islam)命名。在书中,西巴仪主张,“国

① Joshua Teitelbaum,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Syria, 1947—1958: Founding, Social Origins, Ideolog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1, No. 2, Spring 2011, p. 215.

② 有关穆斯塔法·西巴仪的生平简介可以参见: Umar F. Abd - Allah, *the Islamic Struggle in Syria*, pp. 96—101.

③ Itzhak Weismann, “Democratic Fundamentalism? The Practice and Discourse of the Muslim Brothers Movement in Syria”, *The Muslim World*, Vol. 100, Issue 1, January 2010, p. 2.

④ 被外界公认的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的第一代领导人有: 穆斯塔法·西巴仪(1915—1964, Mustafa al - Siba 'i)、穆罕默德·穆巴拉克(1912—1981, Muhammad al - Mubarak)、马鲁夫·达瓦利比(1907—2004, Ma 'ruf al - Dawalibi)、穆罕默德·哈米德(1910—1969, Muhammad al - Hamid)。

⑤ 同注①,第217页。

家控制社会财富”,但是反对无神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者所认为的伊斯兰教社会主义主张被纳赛尔所采用。另一位领导人穆罕默德·哈米德是纳格什班迪教团的苏非兼萨拉菲主义者。而马鲁夫·达瓦利比则是人民党党员,在多次选举中以该党党员身份参加选举。在1963年复兴党掌权后,叙兄弟会内部的激进派别则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最后,叙兄弟会有不同的民主经验。与埃及兄弟会不同,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赞同代议制民主,认为这种政府形式是个人自由的保障,是反专制的。在哈桑·班纳时期,埃及兄弟会超脱于议会之外,主要是和平的宣教活动,有时从事暴力活动。在纳赛尔时期(1954—1970年),埃及兄弟会遭到当局残酷镇压,产生了赛义德·库特布的极端主张。^①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埃及兄弟会的候选人才被允许参加埃及国民议会的选举。而叙兄弟会则参加了1945—1963年间举行的多次议会选举,并且获得了一定数量的议会席位。

合法参政时期(1946—1963年)

1946年叙利亚获得名义上的独立,建立了议会民主制政体。这一时期,多个阿拉伯集团为控制这个独立的国家而展开激烈斗争。然而,独立后的叙利亚政治并不稳定,发生了多次政变和反政变。^②可以说,政党林立,政变频仍、政府更迭频繁成为这一时期叙利亚政治发展的主要特征。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和传统精英的代表,叙兄弟会试图在这种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站稳脚跟。这一时期兄弟会主要采取合法参政方式参与叙利亚的政治生活。

第一,参加叙利亚议会选举,成功获得议席,并有成员进入内阁。自1946年独立到1963年复兴党上台,叙兄弟会参加了1947年、1949年、1954年、1961年的选举,同时也抵制了多次大选。在1947年的选举中,兄弟会并没有提出自己的全国候选人名单,只是在叙利亚几个地区争取选票。根据美国大马士革大使馆的资料显示,穆斯林兄弟会在穆斯林教士联盟的支持下,在大马士革提出了一份完整名单。名单包括四位著名的兄弟会成员:阿卜杜·哈米德·塔巴、阿里夫·塔拉卡基、穆罕默

德·穆巴拉克、艾哈迈德·马扎尔·阿兹玛。此外,这份名单还包括犹太人瓦希德·密兹拉什、库瓦特里的反对者扎基·哈提比、阿里·布祖以及两位确保能当选的人物努里·伊比什、法里斯·胡里。^③在哈马,兄弟会成员穆罕默德·沙卡法参加选举;在阿勒颇,马鲁夫·达瓦利比参加选举。兄弟会有效地利用清真寺网络开展宣传活动。在第一轮投票中,叙兄弟会成员得票数如下:达瓦利比得票超过15000张、穆巴拉克为27008张、沙卡法是9512张。在1949年11月30日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兄弟会在大马士革获得3个席位,达瓦利比在阿勒颇当选,阵线支持的两位独立候选人苏卜希·欧麦尔和乔治·沙里胡卜也在大马士革当选。^④1949年12月19日,扎伊姆发动政变后,西巴仪和伊斯兰社会主义阵线试图联合其他政党和独立人士组成内阁。12月24日,纳兹姆·库德希与伊斯兰社会主义阵线成员穆巴拉克以及兄弟会支持的大马士革独立人士天主教徒乔治·沙里胡卜组成联合政府。然而,军队反对库德希内阁包括了太多的人民党成员(9人中有7人),库德希于次日辞职。独立人士哈利德·阿兹姆于12月27日组成的内阁被军方接受,在该内阁中人民党占4席。兄弟会成员达瓦利比担任国家经济部长,穆巴拉克担任公共事务部长。^⑤值得一提的是,兄弟会成员也有授命组阁的经历。1951年11月8日,阿塔斯总统曾授权兄弟会成员、人民党党员达瓦利比组建新政府。11月28日,达瓦利比成功组建政府。然几天后,12月1日,在军方压力下,达瓦利比就被迫以身体健康原因辞职。1954年3月1日,萨布里·安萨里组建新政府,达瓦利比担任国防部长。1955年4月,西巴仪决定再次参加议会选举,违背了此前兄弟会做出的远离政治的决定。埃

① 赛义德·库特布对叙兄弟会的领导人马尔旺·哈迪德、阿德南·萨德尔丁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② 据统计,1949—1970年,叙利亚总计发生了15次成功军事政变。

③ Joshua Teitelbaum, "The Muslim Brotherhood and the 'Struggle for Syria', 1947—1958: Between Accommodation and Ideolog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0, No. 3, May 2004, p. 137.

④ 在这次选举中,人民党赢得了议会多数(143席中的51席),复兴党赢得3个席位。

⑤ Patrick Seale, *The Struggle for Syria: A Study of Post-War Arab Politics 1945—1958*,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92.

叙联合失败后,兄弟会在1961年12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获得10席。

第二,兄弟会的政治主张态度前后不一,与政府关系远非和谐。1949年3月30日,扎伊姆发动军事政变后,召集纳兹姆·库德希、阿克拉姆·哈兰尼和马鲁夫·达瓦利比讨论建立临时政府事宜。兄弟会在这次政变中的态度是值得关注的。兄弟会欢迎作为拯救国家不稳定和弊病的政变。它宣称如果军队不采取行动,人民将起来反抗。兄弟会呼吁扎伊姆实施“真正的民主政府”改革,提高大多数人的福利。满怀希望的兄弟会领导人很快就失望了,扎伊姆没有实行民主。而且,令他们懊恼的是,扎伊姆将政治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共产党和穆斯林兄弟会。扎伊姆宣称:“我要先对付共产党,然后是兄弟会,我不希望同时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战斗。”^①1949年5月,穆斯林兄弟会和叙利亚其他政党被取缔。而且,扎伊姆寻求与埃及和沙特亲近的外交政策,激怒了兄弟会、人民党和其他政治力量。此外,扎伊姆在凯末尔影响下进行的世俗化改革惹恼了乌勒玛和穆斯林兄弟会。他限制那些掌有公共瓦克夫的乌勒玛,重组家庭瓦克夫的管理。为了阻止人们把宗教用于其他目的,扎伊姆禁止非官方教士带头巾。同时,他采取措施严格限制沙里亚权威,用世俗法律取代它。有传言称扎伊姆要限制男子的离婚权。1949年5月,司法部认为有必要废除个人身份法,赋予每个宗教社团处理自己宗教事务的权利。这些举措被认为不仅会威胁到伊斯兰教的地位,而且会威胁到乌勒玛自己决定瓦克夫基金和财产分配的权力。加之扎伊姆过分嚣张,激怒了所有希望彻底改变旧政权的力量。兄弟会认为,扎伊姆是西方腐化和自由主义的余孽。1949年11月7日,兄弟会出版了《新灯塔报》。11月11日,兄弟会宣布组建伊斯兰社会主义阵线(the Islamic Socialist Front),颁布了新纲领。新纲领基本没有提及伊斯兰教,相反却强调腐败问题和社会平等的必要,支持进步的税收、土地改革、限制私有制、倡导工人权利。^②可以认为,兄弟会只是把伊斯兰作为一个利用符号,其真实的目的是建立一个世俗倾向的临时政府。1952年1月,什沙克里政府关闭了兄弟会叙利亚分部,禁止出版《新灯塔

报》。兄弟会的青年组织富图瓦(Futuwwa,阿拉伯语为青年人)被解散,兄弟会的领导人西巴仪、穆巴拉克、萨拉赫丁·沙辛被捕。

第三,在对外政策方面,兄弟会表现出两面性和灵活性。兄弟会的对外政策主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注巴勒斯坦问题,发表《民族宪章》。1947年9月,穆斯林兄弟会发布了《民族宪章》,声称必须在巴勒斯坦建立阿拉伯国,在《贝尔福宣言》的基础上犹太人自由进入巴勒斯坦。宪章反对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的“帝国主义的大叙利亚计划”。而且,兄弟会所宣称的为巴勒斯坦而进行圣战(吉哈德)仅限于示威和集会。^③二是兄弟会反对与伊拉克联合。其领导人西巴仪强调:“我们支持所有阿拉伯国家;我希望取消人为划定的边界,我们与伊拉克统一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不希望这样的统一限制叙利亚国家的自由与独立。”^④三是在对待共产主义和苏联问题上,兄弟会表现出明显的两面性和灵活性。兄弟会反对共产主义和无神论的唯物主义。但是,兄弟会对苏联的态度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视苏联的态度而定。当共产主义者和苏联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两个国家的时候,兄弟会就攻击苏联。例如,叙兄弟会反对苏联投票赞成1947年联合国巴勒斯坦分治决议。1950年5月1日,叙兄弟会领导人西巴仪在议会上指责阿盟“向英美压力低头”。西巴仪强调如果这种压力继续,阿拉伯国家将与苏联结盟,但并不接受共产主义。^⑤面对西方国家的压力,兄弟会甚至声称“我们将与魔鬼(苏联)签订协议”。在兄弟会组织的游行中甚至出现了自相矛盾的口号:伊斯兰教必须是国教,斯大林万岁,阿拉伯苏联合作万岁。四是叙兄弟会具有强烈反西方立场。1952年1月,兄弟会组织1300人举行示威活动,反对叙利亚的军事独裁和西方防务计划,支持埃

① Umar F. Abd - Allah, *The Islamic Struggle in Syria*, p. 100.

② Joshua Teitelbaum, “The Muslim Brotherhood and the ‘Struggle for Syria’, 1947—1958: Between Accommodation and Ideolog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0, No. 3, May 2004, p. 140.

③ 同注①,第138页。

④ Joshua Teitelbaum, “The Muslim Brotherhood and the ‘Struggle for Syria’, 1947—1958: Between Accommodation and Ideolog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0, No. 3, May 2004, p. 140.

⑤ 同上,第145页。

及的反西方立场。总之,叙兄弟会的“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口号在其外交主张的实践中是打了折扣的。

综上所述,在议会民主制时期,叙兄弟会与该国其他政治组织的命运相似,虽能公开参加议会选举,但脆弱的议会制安排往往被军人政变所打断。在政变频仍的政治环境下,政党难逃被解散的命运,兄弟会的报纸和杂志也多次被停办。然而,从以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是叙兄弟会最有影响力的时期。此外,从活动和斗争方式上看,这一时期兄弟会主要采取合法参政方式参与叙利亚的政治生活,在街头活动中主要采取游行、示威等非暴力形式。

转向激进时期(1963—1982年)

1963年3月,叙利亚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曾经是兄弟会重要对手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通过政变,掌握了叙利亚政权。国内外学者多从复兴党当局与兄弟会关系的角度来考察这一时期叙利亚伊斯兰运动的发展。而从叙兄弟会自身发展的视角来看,这一时期叙兄弟会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1963—1970年和1970—1982年两个时期。在前一时期,叙兄弟会内部斗争较为激烈,发生了领导人危机,虽有暴力行动,但非暴力派别依然占主导地位。在后一时期,以哈迪德、萨德尔丁为代表的激进派逐渐占据主导,发起了大规模暴力圣战活动,导致1979年阿勒颇事件和1982年哈马事件等悲剧的发生。此时的叙利亚兄弟会,内部大致可以分为海外流亡集团、国内激进集团、国内温和派(支持阿塔尔的叙兄弟会大马士革分部)等派别。^①

1963年3月,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发动军事政变,兄弟会连同其他政党再度被禁止活动。从此,叙兄弟会作为宗教性的政党,一直以政治反对派的面目从事反对复兴社会党政权的斗争,成为叙利亚政治生活的显著特色之一。斗争的焦点是复兴党的世俗化和国有化政策。这些斗争的背后是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较量,而非意识形态层面的较量。

复兴党执政的最初五年间,国家经济改革措施是土地改革和对工商业的企业国有化。改革使贫苦的农民获得了一定的土地,使民族工商业有所发展。

随着改革的深化,国家的权力结构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一批支持军政权的文职官员被吸收到政府部门,协助军官们主持政务。改革的负面效应加剧了利益冲突和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国有化政策的实施扩大了公营部门,侵害了工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批发商的利益,中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利益也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他们大多属于逊尼派穆斯林。由于国有化政策所致,他们在情感上大多同情和支持被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的穆斯林兄弟会。此外,叙利亚的大部分伊斯兰教教职人员薪水很低,他们大多在教务活动之余经商以维持生活,因此也对政府不满。

叙兄弟会从1964年开始加强反政府活动。^②4月,逊尼派穆斯林的中心哈马市发生了反政府动乱,当地著名的苏丹清真寺的教长提出了“要伊斯兰教还是要复兴党”的挑战口号,向复兴党政府施加压力。政府保安部队在开枪示警中毁坏了清真寺的一座尖塔,兄弟会便在全国各大城市发动了总罢工以示抗议,这就是叙利亚历史上的“四月危机”。它尽管遭受了当局的镇压,但已表明兄弟会采取不同于此前的斗争手段,开始以暴力从事其宗教—政治活动。^③兄弟会与复兴党政权的第二次冲突是在1966年5月。《人民军队》报的署名文章,引发了兄弟会的示威和暴乱。政府再次依靠工人民兵取得了兄弟会斗争的胜利。而且,自1963年军事政变以后,同情和支持兄弟会的军官逐步被清洗,代之以忠于政府的阿拉维派和德鲁兹派背景的军官。到1968年,阿拉维派军官已经基本上控制了军队,成为政府武装力量中的实力派。

1967年,叙利亚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遭到惨败。兄弟会领导层在对以色列和对政府的态度上产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发生了1969—1970年的领导层危机。以大马士革为基地的温和派,在流亡西德

① 综合国外学者的资料以及兄弟会网站公布的领导人资料,这一时期兄弟会的领导人有温和派和激进派之分。温和派领导人有伊沙姆·阿塔尔(Isam al-Attar)等;激进派领导人有马尔旺·哈迪德(Marwan Hadid,1976年死于狱中)、阿德南·萨德尔丁(Adnan Sa'd al-Din)、赛义德·哈瓦(1935—1989, Sa'id Hawwa)等。

② [英]迪普·利希罗著:《中东内幕》,叶进、汪忠民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7页。

③ 金宜久、吴云贵著:《伊斯兰与国际热点》,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128页。

的宗教领袖伊沙姆·阿塔尔的领导下,反对同以色列军队进行正面对抗,主张积蓄力量,等待反击的时机。以马尔旺·哈迪德为首的强硬派,以霍姆斯、哈马、阿勒颇等北部城市为基地,主张以“圣战”来收复失地。^①为此,哈迪德及一批年轻的追随者转移到邻国约旦,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下属的“法塔赫”突击队营地接受培训,并不断袭击以色列军警。

1970年阿萨德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后,叙利亚政治进入阿萨德时代。在这一时期,叙利亚兄弟会先是借1973年的宪法问题,向政府施压;后与叙利亚政府的关系日趋紧张,发起了1976—1982年的伊斯兰大起义,最后遭到清洗。

1973年1月,叙利亚人民议会通过了一部新宪法,使兄弟会再次找到了攻击的口实。因为新宪法充分肯定了复兴社会党的领导地位,规定叙利亚是“民主的、民众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对伊斯兰教在国家政治生活的地位却只字未提。兄弟会的代言人攻击新宪法是世俗的、无神论的宪法,要求增补条款,肯定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其后游行示威连续不断,罢工、罢市接连发生。为了恢复秩序,政府通过议会提出妥协方案,在宪法中增补了“国家元首必须是穆斯林”条款。与此同时,政府逮捕了几名闹事的带头人,暂时平息了风暴。此后不久,在一批对新宪法不满的伊斯兰学者的煽动下,掀起了全国范围的示威抗议,结果在逊尼派穆斯林聚居的北部地区,人数众多的选民抵制了就新宪法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后来在民众与保安部队的几次冲突中造成了伤亡80余人的惨案。^②

1973年斋月战争后,阿萨德政府与兄弟会的关系暂时缓和。兄弟会对政府的批评仅限于指责国家丢失了戈兰高地和参与基辛格发起的中东和平进程。然而,兄弟会与阿萨德政府的关系不久又因叙利亚军队介入黎巴嫩内战而急剧恶化。1976年6月,叙利亚军队开进黎巴嫩,支持内战中的一方马龙派基督徒反对黎巴嫩穆斯林和巴勒斯坦人,此举使叙利亚社会各阶层受到一次强烈的震动。兄弟会开动其全部宣传机器,对阿萨德的“倒行逆施”进行全面攻击。它们指责政府充当了马龙派、以色列和美国的代理人,屠杀穆斯林兄弟,指责政府专制腐败,

号召以“圣战”来推翻不义的统治者。从此兄弟会走上了暴力斗争的道路。

一般认为,兄弟会的暴力斗争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76年7月—1979年5月为“圣战”的第一阶段,1979年6月—1980年8月为“圣战”的第二阶段,1980年8月—1982年2月为第三阶段。^③这一时期,阿萨德政府对兄弟会采取了暴力镇压手段,而兄弟会则继续使用暴力手段向叙利亚政府施压。而且,叙利亚兄弟会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伊拉克、约旦、以色列等国家的支持和资助。^④为了更好地反对阿萨德政权,兄弟会联合叙利亚国内各种政治力量成立了叙利亚伊斯兰阵线,并于1980年11月9日发布了《伊斯兰阵线宪章》,内容涉及土地所有制、工业化、教育、银行和货币政策、群众动员、兵役制度等等与现代伊斯兰国家相关的基本问题。^⑤总之,这一时期阿萨德政府与兄弟会之间的暴力与反暴力成为这一时期叙利亚国内政治形势的主要特征。在伊斯兰极端主义和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下,这一时期叙兄弟会也主要采取暴力手段来反对阿萨德政权。不幸的是,暴力斗争的结果是兄弟会力量的大大削弱。

海外流亡时期(1982年至今)

1982年哈马惨案发生后,兄弟会的多数领导人

① 20世纪60年代初,马尔旺·哈迪德曾在埃及学习,受到埃及兄弟会领导人赛义德·库特布思想的影响,主张在叙利亚开展暴力反抗斗争。70年代中期,哈迪德在哈马成立了穆罕默德军。该组织是一个极端狂热的地下组织,主要从事反政府暴力活动。Eyal Zisser, “Syria, the Ba ‘th Regime and the Islamic Movement: Stepping on a New Path?” *The Muslim World*, Vol. 95, Issue 1, January 2005, p. 47.

② 吴云贵、周燮藩著:《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65页。

③ 同注②,第366—371页。亦可以参见:Umar F. Abd - Allah, *the Islamic Struggle in Syria*, pp. 108—111.

④ 同情叙兄弟会的学者阿卜杜拉赫认为,沙特、约旦、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并没有为叙兄弟会提供财政支持。他认为,叙兄弟会的资金来源有三,即成员的会费、同情者的捐赠、国外兄弟会(包括各种伊斯兰组织)的资金援助。See: Umar F. Abd - Allah, *The Islamic Struggle in Syria*, p. 110.

⑤ 《宪章》的英文译文,可参见:Umar F. Abd - Allah, *the Islamic Struggle in Syria*, pp. 201—267.

被投进监狱。^①以兄弟会首领阿德南·乌卡拉为代表的强硬派后来被驱逐出伊斯兰阵线,而温和派则于1982年3月结成由17个反对派组成的“解放叙利亚民族联盟”。联盟政治纲领包括:建立宪政议会制政府,以伊斯兰教为国教,以伊斯兰教法为国家立法和改革的主要渊源等。在大约经历了十余年的沉寂之后,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阿萨德总统的政策调整和宣布特赦,兄弟会再度成为一支重要的反对派力量。2000年巴沙尔上台后,叙兄弟会的影响渐大,最终有可能成为一支对叙利亚政治进程起关键作用的力量。分析这一时期的叙兄弟会,可从叙利亚政府和兄弟会两个角度进行。

首先,阿萨德和巴沙尔父子开始放宽宗教政策,尊重民众的传统宗教信仰。阿萨德尊重宗教信仰的政策自不待言。其子巴沙尔上台后,继续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开启了所谓的“大马士革之春”改革运动。2002年12月,巴沙尔在哈马的欧麦尔·伊本·克塔布清真寺参加了周五聚礼(主麻)。2003年6月,巴沙尔开始允许义务兵有条件地在军营礼拜。同时,巴沙尔也加强发展与邻国约旦、伊拉克的关系,阻断兄弟会的海外财路和联系。2002年2月,约旦当局关闭了兄弟会的政治局和情报机构,禁止兄弟会的舒拉委员会(协商会议)在约旦开会。这样,巴彦努尼被迫离开约旦,前往伦敦。叙当局开始向市民开放宗教信仰,允许其着传统服饰包括妇女的头巾、以穆斯林的方式生活,更多地参加礼拜和聚礼。赛义德·库特布的书在叙利亚街头也可以买到;2004年初,全国有宗教学校120个,其中7所学校授予学位,宗教机构或研究中心20个,约25000名学生,其中2000人是外国学生。^②

其次,阿萨德政府为了保持自身的合法性,宣布特赦,允许多数兄弟会成员和反对派成员以独立人士身份参加议会选举。1980年颁布的第49号法案规定凡同情穆斯林兄弟会或加入兄弟会就要判处死刑。进入90年代之后,政府释放了多名参与伊斯兰起义的兄弟会成员。^③同时,阿萨德也表现出对兄弟会成员大度的一面。1997年2月16日,兄弟会领导人阿卜杜·法塔赫·阿布·胡达去世后,阿萨德总统曾发去唁电,阿勒颇省省长和多名地方官员

前往阿布·胡达家中表示慰问。^④1997年2月底,大马士革媒体大幅报道了阿布·胡达家族写给阿萨德总统的信。在信中,该家族感谢阿萨德总统的唁电。

第三,政府继续努力将阿拉维社团伊斯兰化。1973年,黎巴嫩什叶派领袖毛拉·萨德尔承认叙利亚阿拉维派是什叶派。此后,政府一直允许伊朗神职人员在阿拉维派聚居区活动,许多阿拉维派的学生也前往伊朗学习。1992年,阿萨德在家乡卡拉达赫为他去世的母亲娜伊莎修建清真寺。

最后,继续笼络温和派宗教人士,巩固政权合法性。在1990年议会选举前,阿萨德试图组建穆罕默德·萨义德·布提领导的温和派伊斯兰政党,但未能取得成功。^⑤同时,阿萨德也竭力笼络叙利亚教职人员。艾哈迈德·卡夫塔鲁(1910—2004年)就是最好的例证。卡夫塔鲁的命运与阿萨德政权的兴衰密切地联系在一起。1964年,他成为叙利亚的大穆夫提。1974年,卡夫塔鲁建立起叙利亚最大的阿比·努尔(光中心)宗教中心,由其子萨拉赫丁·卡夫塔鲁掌管该中心,约有来自60个国家的5000名

① 但这并不意味着叙兄弟会停止了暴力活动。1986年4月国庆前夕,以阿拉维派返乡度假的军校学员为目标,在霍姆斯、哈马、阿勒颇等地几乎同时制造十余起爆炸。据官方公布的材料,有750名军人丧生,150余名受伤。参见金宜久、吴云贵著:《伊斯兰与国际热点》,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页。

② Eyal Zisser, "Syria, the Ba 'th Regime and the Islamic Movement: Stepping on a New Path?" *The Muslim World*, Vol. 95, Issue 1, January 2005, p. 49.

③ 在几次总统特赦中的人数如下:1991年12月,2864人;1992年3月,600人;1993年11月,544人;1995年11月,1200人;1998年,250人;2000年11月,600人。参见:Eyal Zisser, "Syria, the Ba 'th Regime and the Islamic Movement: Stepping on a New Path?" *The Muslim World*, Vol. 95, Issue 1, January 2005, p. 49.

④ 阿卜杜·法塔赫·阿布·胡达,1976—1982年任叙兄弟会的领导人,1982年哈马惨案后逃亡沙特,宣布放弃政治斗争,躬耕于学术,他在吉达的阿卜杜·阿齐兹大学教书,出版了数十本教义著作。1995年12月,阿布·胡达被获准回到叙利亚。在大马士革当局的安排下,他被允许回到家乡阿勒颇。前提是他必须从事教育和宗教活动,远离政治活动。1996年年中,他返回沙特。1997年2月16日归真。

⑤ 穆罕默德·萨义德·布提,库尔德人,1927年生,是阿萨德的密友。在聚礼日的演讲中,他赞扬阿萨德说:“在阿萨德总统的领导下,叙利亚成为整个穆斯林世界的焦点。大马士革的清真寺欣欣向荣,参加礼拜者的人数日益增加。”布提是大马士革沙里亚学院的研究生,其博士论文是伊斯兰宗教法的起源。布提写过多篇关于伊斯兰教的文章,多数是为了论证阿萨德政权的合法性。例如,布提写过一本论吉哈德的书。在书中,他极力攻击兄弟会的行为违背伊斯兰教原则,引发了叙利亚内战。他反对建立宗教政党。他说:“我总是担心极端因素渗透进政党,成为播种分歧和暴力的工具。”

学生在该中心学习。多年后,他建立了一个纳格什班迪教团,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为卡夫塔里耶。卡夫塔鲁以他的声明著称:“伊斯兰教和政府实施法律的权力是双胞胎。考虑其中一个而不考虑另一个是不可能的。伊斯兰教是基础,政府的统治权是保护人;毕竟一个没有基础的事物注定会崩溃、衰落,一个没有保护人的事物将会消亡。”在接受采访时,他说:“我认识阿萨德 35 年了,我尊重他的性格和人格,他对信仰的坚定和忠诚。我认为他是一个坚定的战士,他从未放弃民族权利,毫不犹豫地支持阿拉伯和伊斯兰的活动。阿萨德在宗教领域的活动有助于提高我们国家的宗教和精神生活。在他统治时期,修建清真寺,整修礼拜大殿,开办宗教大学,重建古老场所以保护阿拉伯和伊斯兰特色。阿萨德告诉我,他希望伊斯兰大旗高高飘扬,这对他来说是信仰和道路问题。阿萨德以自己是一个有伊斯兰信仰的阿拉伯人而自豪。他说伊斯兰教是进步的革命,因此人们无权以是阿拉伯人为荣,而无视伊斯兰教。(言外之意,不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不是阿拉伯人。)”^①

在这样的背景下,叙利亚政府与伊斯兰运动的和解进程开启了,叙兄弟会也随之着手进行改变。1997 年,阿勒颇的乌勒玛原兄弟会成员穆罕默德·阿明·亚卡尼提出和解倡议。^②1998 年,政府作出回应,并提出了和解的三个步骤:兄弟会为 1976—1982 年的起义道歉,以个人名义返回叙利亚,承诺不参加兄弟会的任何活动。为此,兄弟会总训导师阿里·萨德尔丁·巴彦努尼成立了一个评估委员会重新检视 1976—1982 年的起义。委员会提交的报告认为,兄弟会采取的行动是错误的,把责任都推给了阿德南·萨阿德丁。^③然而,调解因 1998 年 12 月 16 日亚卡尼被不明身份人员暗杀而宣告失败。兄弟会的发言人要求调查此事。在调解失败后,兄弟会领导人巴彦努尼开始攻击叙利亚政权,认为它是一个派别的,属阿拉维的,再次表达了对与政府进行对话的失望。

另一方面,为了展示自身实力,叙兄弟会积极寻求变革,与其他反对派开展合作,并在 2011 年 3 月开始的叙利亚危局中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首先,放弃了许多以往的政治主张。2001 年 5 月 3 日,叙利亚兄弟会发表了《民族尊严政治行动宣言》,承诺从事民主政治行动,强烈谴责使用暴力。然而,政府对宣言的反映是消极的。叙利亚高级官员说:“宣言表明了兄弟会力图从危机中恢复的企图,它试图通过新的认同重获在叙利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他们还表示:“任何熟悉该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特征的人都不会被宣言所蒙蔽。兄弟会过去是一个手握沾满鲜血之剑的组织,现在又谈什么共存。这是一个恐怖主义组织……穆斯林兄弟会认为叙利亚存在政治和组织真空,出现了复兴和填补真空的机遇。”^④2002 年 8 月 23—25 日,兄弟会相关人员在伦敦召开会议,为“民族宣言”起草一个可以接受的方案。他们邀请叙利亚国内外政治领域的人物与会,然而回应邀请的人并不是很多,参加会议的多是亲近兄弟会的人,或者没有回到叙利亚的人。

其次,寻求与叙利亚国内外的其他反对派合作。2005 年,在接受采访时,兄弟会领导人巴彦努尼表示要与叙利亚其他反对派进行合作。^⑤这一主张得到了叙利亚其他派别的回应。同年 4 月,市民社会复兴委员会呼吁与其他组织(包括兄弟会)“开放对话渠道”。9 月 8 日,叙利亚人民民主党一政治局派领导人里亚德·图尔克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愿意与兄弟会进行合作。2005 年底,叙利亚前副总统卡代姆叛逃后,寻求与兄弟会接触。从此,叙利亚反对派活动逐渐活跃。2005 年 10 月 18 日,反对派发表了《大马士革宣言》。《大马士革宣言》确定了民主、非暴力、反对合作和民主变革四项指导性原则。《大马士革宣言》由五个政党联盟和公民社会组织及九名知识分子签名后发布,24 小时内,叙利亚国内外多个组织宣布支持该宣言。2006 年 3 月,叙利亚反

① Eyal Zisser, “Syria, the Ba ‘th Regime and the Islamic Movement: Stepping on a New Path?” *The Muslim World*, Vol. 95, Issue 1, January 2005, pp. 51—52.

② 穆罕默德·阿明·亚卡尼 20 世纪 60 年代曾是兄弟会的总训导师,70 年代兄弟会从事暴力活动后,他宣布与兄弟会决裂,支持阿萨德,并获得了保护。1998 年 12 月 16 日,亚卡尼被暗杀身亡。

③ 同注①,第 54 页。

④ 同注①,第 57 页。

⑤ 2010 年 8 月,巴彦努尼辞去叙兄弟会领导人职务,穆罕默德·里亚德·舒克法(Muhammad Riyad al-Shuqfa, 1944 年生)接替其担任兄弟会领导人。

对派在布鲁塞尔成立了全国解放阵线(NSF) ,强调自由价值观念,即宗教、族群、政治和思想多元化;权力流转;结束对库尔德人的歧视。^①

最后,在当前危局中成立全国委员会,成为重要的反对派力量。2011 年 3 月,阿拉伯变局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影响到叙利亚,巴沙尔面临着执政 11 年以来的最大挑战。兄弟会在这次叙利亚乱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1 年 10 月,兄弟会与国内其他反对派联合组成了叙利亚全国委员会,旨在形成统一的反对派框架,目标为推翻并取代叙利亚现政权,声称反对外国干预,但同时呼吁国际社会“保护叙利亚人民”。

余 论

自成立至今,叙兄弟会积极参加叙利亚政治和社会生活,影响着叙利亚民族和国家构建的进程,其力量不容小觑。同时,我们在描述该兄弟会发展演变史的同时,不能不看到叙利亚政治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制度的缺失、民族与国家构建的失误和具体政策的失策是导致今天叙利亚发生巨变的深层次原因。

就具体政策层面而言,自 1946 年独立以来,叙利亚历届政府一直未能处理好宗教与国家、宗派利益和国家利益、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正如学者所言:“部落家族主义、地区主义、宗派主义是叙利亚现代化和民族国家构建的三个关键词。”^②毫不夸张地说,在叙利亚现代化进程中,到处呈现着传统与现代、效率与公正之间的二律背离现象,时至今日也未能得到妥善解决。

就制度层面而言,透过叙兄弟会的历史演变,我们不难窥见叙利亚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宗教与国家、权威与参与之间的矛盾。之所以会产生这些矛盾,主要原因是制度层面的缺失。时至今日,叙利亚政治精英一直未能达成一种合理的政治安排,结果导致自身合法性的丧失,远未达到学者所谓的“制度的文明自觉”。^③就未来而言,叙利亚的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最后,考量叙利亚兄弟会的发展演变和叙利亚政治现代化进程,我们不难发现,叙利亚政治精英一

直未能正确处理好宗教与世俗、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各种关系。叙利亚政治现代化的个案或许印证了学者的研究结论:“对于一个特定的民族和国家来说,现代化的发展和文明的演进决不能脱离其民族性及其固有的传统和宗教文化。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的发展战略必须是其历史的一种合理延续,并需要进行与时俱进的变革,实现现代因素与传统因素的有机融汇。否则,就有可能走向死胡同,或是为各种失误而付出沉重的代价。”^④◎

(责任编辑:沈友余)

① 库尔德人在叙利亚被称为“国家的合作者”,1962 年库尔德人失去了公民权利。截至目前,叙利亚国内大约有 13 个库尔德人政党。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和叙利亚库尔德民主阵线是《大马士革宣言》的签署方之一。

② Nikolaos Van Dam,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Syria: Sectarianism, Regionalism and Tribalism in Politics: 1961 - 1978*, New York: ST. Martin Press, 1979.

③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彭树智先生认为,政治交往的关键是制度的观念,制度基础是文明交往的基础。引申开去,一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就是一国国内的政治交往。参见:彭树智著:《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 402、420 页。

④ 彭树智主编,王铁铮、黄民兴等著:《中东史》,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第 479 页。